

名著选译丛书

古代文史

魏晋南北朝

译注

漆泽邦

审阅

安平秋

南史选译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

图书馆

★藏书★

Z121.7
16:24

77806

南史选译

社会主义学
书 馆
藏 书 ★

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

责任编辑：何 锐
封面题签：启 功
封面设计：陈世五
技术设计：盛寄萍
插 图：赵映岡

●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

南 史 选 译

漆泽邦 译注

巴蜀书社出版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960毫米1/32

印张11

字数160 千

1990年6月第一版

1991年1月第二次印刷

印数：15,000—65,000册

ISBN7-80523-375-8/Z·27

定 价：140.00 元(50种)

DJ13/26



序

《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与广大读者见面了。这是丛书编委会的同志与众多专家学者通力协作、辛勤耕耘的结果。

中华民族在五千年漫长的岁月里，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给人类留下了丰富的精神财富。“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今天，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为指导，整理研究我国古代文化典籍，做到汲取精华，剔除糟粕，古为今用，推陈出新，使人们在正确认识民族历史的同时，得到爱国主义的教育，陶冶道德情操，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使文明古国的历史遗产得以发扬光大，这是我们每个炎黄子孙的责任。而要做到这样，对古籍进行整理与研究是重要的基础工

程。但是，整理与研究古籍仅作标点、校勘、注释、辑佚还不够，还要有今译，使老年人、中年人、青年人都愿意去读，都能读懂，以便从中得到教益。

基于以上认识，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于一九八六年五月组成了以章培恒、马樟根、安平秋三位同志为主编的《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编委会，确定了以全国十八所大学的古籍整理研究所为主力承担这一看似轻易、实则艰巨的今译任务。在第一次编委会议上，拟定了《凡例》、《编写与审稿要求》、《文稿书写格式》和一百余种书目，以每一种书为十万至十五万字计算，这套丛书大约有一千余万字，应该说是一项大工程。经过一年的努力，完成了第一批三十六部书稿的译注任务。在各研究所的专家与所长把关的基础上，于一九八七年五月和七月，先后在复旦大学、北京大学召开了部分编委参加的审稿会，通过了二十五部书稿，作为《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与广大读者见面的第一批作品。与此同时，在一九八七年七月六日，邀请了在京的十几位专家教授与编委会十几位编委一起座谈这套丛书与古籍今译的问题。专家们肯定了今译工作的必要性与深远意义，并以他们数十年的教学科研和创作的经验，说明今译是一项

难度很大的工作，是培养人才，使之打下坚实基本功的一种有效方法，专家们还对《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提出了宝贵的建议，这对当时的审稿工作和保证《丛书》的质量起了很好的作用。

实践证明，古籍的今注不易，今译更难。没有对作品的深入、透彻的研究，没有准确、通俗、生动的语言表达能力，要想做好今译是不可能的，两年多来，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在探索古籍的今注、今译的道路上，做了一些工作。这部丛书的出版，是系统今译的开始，说明古籍整理研究工作有了新的进展。更可喜的是，一批中青年学者参加了今注今译工作，为古籍整理增添了新生力量，相信他们会在实践中，在学习中，成长成熟。我希望，这套丛书的编委会和高校各古籍整理研究所要敞开大门，加强同国内外专家学者的联系，征求他们和广大读者的意见，并向有真才实学而又适宜做今译工作的专家学者约稿，以提高古籍译注的水平，使《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的第二批、第三批作品的质量更上一层楼。

这是一套以文史为主的大型的古籍名著今译丛书。考虑到普及的需要，考虑到读者的对象，就每一种名著而言，除个别是全译外，绝大多数是选译，即对从该名著中精选出来的部分予以译注。译

文力求准确、通畅，为广大读者打通文字关，以求能读懂报纸的人都能读懂它。我希望这套丛书能成为中小学教师们的语文、历史教学的参考书，成为大专院校学生的课外读物，成为广大文史爱好者的良师益友。由于系统的古籍今译工作还刚刚起步，这套丛书定会有不少缺点、错误，也诚恳地希望读者批评指正。

巴蜀书社要我为这套丛书写序，我欣然接受了。我相信这套丛书不仅会使八十年代的人们受益，还将使子孙后代受益，它将对祖国的繁荣昌盛起到点滴的作用。最后借此机会向曾给予我们支持、帮助的专家学者和巴蜀书社的同志表示衷心的感谢！并殷切地希望台湾同胞、港澳同胞、海外侨胞和我们一同做好祖先留给我们的文化遗产的整理工作，为中华民族灿烂的文化再放异彩而努力！

周 林

一九八七年十月于北京



前 言

《南史》是唐代李延寿私人修撰的一部史书，同时又修撰《北史》。自唐太宗贞观十七年（643年）开始编写，唐高宗显庆四年（659年）完稿，上奏朝廷，前后历十六年。

《南史》和《北史》的编著，是从李延寿的父亲李大师开始的。大师字君威，世居相州（今河北临漳县西南邺镇），学识渊博，《唐书》未予立传，据《北史·序传》，大师十分好学，博览群书，善于写文章，对前代故事也非常熟悉。隋末农民大起义后期，窦建德在河北地区建立夏政权，大师被召为夏国的尚书礼部侍郎。唐高祖武德三年（620年），建德派他入京与唐讲和，过后又违背和约，出兵助王世充袭击唐军。高祖大怒，扣留使节。王世充、窦建德相继平定后，大师被流放到西

会州（今甘肃靖远），直到武德九年（626年）才赦归长安（今西安）。当时，尚书右仆射封德彝、中书令房玄龄都劝他留在京师做官，大师不愿，整装东归，两年后（贞观二年——628年）的五月去世。

大师流放会州时，抑郁不乐，曾著《羁思赋》抒发胸怀。时值杨恭仁镇守凉州，见到大师之作，赞赏备至，将他接到河西，留在家中朝夕讲论。恭仁家富于藏书，大师得以随意翻阅。两年以后，杨恭仁被调回京师任吏部尚书，大师只得又回到会州。

大师素有编著史书的志向，常认为南朝宋、齐、梁、陈和北朝魏、齐、周、隋八朝因南北分隔。南朝史书称北方为“索虏”，北朝史书指南方为“岛夷”。又各自记载本朝事迹周悉，对别国则不完备，同时往往失实。因此常想改正这种状况，仿效《吴越春秋》的体例编一部编年体的南北史书，叙述南、北八朝事迹。在河西杨恭仁家客居时，他已经开始搜集资料，撰写编年体的草稿。遇赦回京后，不愿留在朝廷做官，急着回家，他家里藏书也多，于是翻阅披览，继续编写。不幸的是他没有完成《南北史》的编著，两年以后就含恨去世了。从我们所知李大师简略的身世可以看出，他对隋、唐时期已形成统一局面，南北仍沿用

互相敌视的语言如“索虏”“岛夷”一类的称呼很不满意。又因各自的国史都记载本国详细，记他国则不完备，而且往往失实，因而要打破南北朝代断限，通编南北各朝历史，这种见解是十分卓越的。

李延寿编著《南史》和《北史》，主要是子承父业，继续完成乃父之作。李延寿的生平事迹，史籍记载得十分简单。据《新唐书·李延寿传》，我们只知道他在唐太宗贞观中担任过太子典膳丞，崇贤馆学士，以其修撰功绩转御史台主簿，并兼修国史。《南北史》毕功后，又撰《太宗政典》三十卷进上高宗皇帝，升任符玺郎，不久即去世。正因史籍记载简单，我们无法弄清他的生卒年。唐太宗贞观三年（629年）成立史馆，李延寿与敬播俱在中书侍郎颜师古、给事中孔颖达手下删削史料，这应是他正式参与政府修史工作的开端，时已成年。

《南北史》是唐高宗显庆四年修成上奏的，这时他还活着。过后又编写了《太宗政典》三十卷。根据这个简略的记载，李延寿到底活了多大年纪，无从确切考知，但他参加修史的时间是唐太宗贞观年间到唐高宗显庆中，则可以肯定。

李延寿编修《南北史》的过程相当艰苦。他的父亲在世时，父子间时常讲论，使他增加了不少知识。贞观三年进史馆，欲继承父志编完南北史书，

但齐、梁、陈史料原来没有搜集到，于是利用编辑之暇和史馆的条件，昼夜抄录。贞观五年（631年）母亲去世，丁忧在家，服丧期满后，入蜀为官，准备将已搜集到的资料开始编著，但提起笔来，又深感材料缺乏，不能编写下去。直到贞观十五年（641年）回京任东宫典膳丞时，史馆总监令狐德棻启奏太宗，命延寿编写《晋书》，又进史馆，始见到宋、北齐、北魏三代史料。贞观十七年（643年），尚书右仆射褚遂良奉诏修《隋书》十志，又命李延寿参预撰录，这才最后搜集到南北八朝正史的资料，李延寿家境贫困，不能雇人抄写，只得亲自动手，昼夜集录，自此正式开始编修《南北史》。他充分利用父亲遗留下来的编年体草稿，在史馆又搜集到南北正史八书资料，另外还采集杂史一千多卷。李延寿对这些资料删烦去冗，将编年体进行改写，依据《史记》体例，写成纪传体的南、北两部通史。《南史》起自宋武帝刘裕永初元年（420年），终于陈后主陈叔宝祯明三年（589年），历时一百六十九年，共八十卷。有帝王本纪和诸种列传而无志。这是因为他刚参加编完《隋书》十志，贯串了南、北两朝的典章制度，如果再为《南史》立志，势必重复，没有必要。《南史》比《北史》先编成，进呈监国史、国子祭酒令狐德棻。德棻读

后，对乖误之处加以改正，然后上奏皇帝。

《南史》经李大师、李延寿父子两代，用了十多年的功夫，参阅了大量资料，进行严格的增删修正；编成后，又经当代著名史学家令狐德棻亲自修改，质量是相当高的，是一部很有价值的史书。但《新唐书·李延寿传》却说当时人见他年轻位卑，对他编写的《南北史》不大称道。说明唐初门阀观念存在，对一个人的家世十分看重，何况李延寿的父亲李大师在窦建德的夏政权中任过尚书礼部侍郎，是唐朝的对立面，因此对他的后人有偏见，这是不足为怪的。实际上《南史》修成后，李延寿已经不能算是年轻了。

南朝时期，南方士族已开始没落。门阀制度在曹魏后期最终形成，经过西晋一代的巩固，到东晋充分发展，至南朝，已经历了一百多年。在这漫长的岁月中，高门士族凭借特权坐致高官厚禄，在长期养尊处优的生活中自行腐朽；在他们争权夺利的内部斗争中互相削弱；在农民起义的不断打击下被消灭。尤其是东晋末年的孙恩起义，将北府兵最后一个士族将领、谢安的儿子卫将军谢琰杀死。此后，北府兵就落入寒门手中，到南朝，士族已不再执掌兵权。因此，南方士族在南朝时开始没落，已成无法挽回的趋势。但越是日暮途穷，越要拼命维护他们的特

权地位，尤其要保住世代相传的族望；士庶之间的界线也更加不可逾越。这种时代的特色在《南史》中得到充分反映。《南史》的一个显著特点，和《北史》一样，在列传中大多采用家传形式，按一个族的世系而不依某一历史人物的时代立传。凡是一个族的子孙都附在一个先祖名下，往往一个传附上一大串人，有些人根本没有什么事迹可记，只两行字一篇的都有。这样一来，不是这支望族的人，虽然同姓，也不致混入他们的行列，这就维系了他们本族的特殊地位。只有专传例外，如《儒林》、《文学》、《孝义》、《恩倖》等，是按人物的特点类型集中在一起。

南朝是寒门庶族上升的时代，宋、齐、梁、陈四代皇族都出身寒门，寒门人士在各代政权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士族地主虽凭借家世族望踞居高位，仍有特殊的社会地位，而其中具有真才实学，善于治国用兵的人虽不能说完全没有，然而已经不多了。在“士胄踞高位，英俊沉下僚”的年代，寒门被长期压制，他们的本事得不到施展。如今一旦发展起来，成为一种新的力量，表现出卓越的才干，皇帝在治理国家方面不能不依靠他们。齐武帝时，有个寒门出身的刘系宗，非常能干，受到武帝的信任和重用。齐武帝曾说：那些高门望族出身的学士们根

本不会治理国家，只会读死书。治理国家，一个刘系宗就够了。这代表了南朝皇帝对士族与寒门两个阶层的态度。《南史·恩倖传》较多的收录了受到皇帝宠信的极有才干的寒门人士，有些人的传是整篇补入的。这些人或在中央担任中书通事舍人，典掌国家机要，又兼任高级官职，他们的权力比皇帝还大；《恩倖·戴法兴传》记载民间流传法兴是真天子，皇帝是假天子。或在地方上担任典签，亦称签帅，掌握州部大权，权力超过藩君。《恩倖·吕文显传》集中反映了这两个方面的情况。《萧子伦传》更突出叙述了典签权力之重，在诸州只听说有签帅，不知道有刺史。齐明帝萧鸾夺取皇位，大杀高帝、武帝一支子孙，诸王在各州纷纷被诛杀，都是典签干的，竟没有一个人反抗。看起来似乎令人痛心，但在这种现象的背后，突出表明了寒门势力上升的现实。李延寿对这一点是看得很清楚的，因此作了如实的记载。

南朝时期，受当时各种条件的制约，没有爆发过规模巨大的农民起义，《南史》也没有专门为农民领袖立传，但对南齐时富阳唐寓之因反对检籍扰民发动反抗的史料，分别在虞玩之、茹法亮、刘系宗等人的传记中保留下来。传略揭发政府在清查户籍中的弊端，因而“百姓怨望”，“百姓嗟怨”，说明

唐寓之起义完全是官逼民反，流露出作者对人民的深切同情。这可能与李延寿的父亲参加过窦建德起义有着某种程度的联系。

《南史》删掉了宋、齐、梁、陈书中“索虏”一类民族间互相鄙视的字眼，因为编书时国家早已统一，经过三百多年的发展，这一时期的民族大融合已经完成，民族的界线和隔阂已基本消失。到唐代，我们只能从一些人的姓氏上知道他们是什么民族的后代，从文化上已看不出任何痕迹，正如陈寅恪先生在《唐代政治史论述稿》上篇中所说的，在民族区别的看法上，文化重于血统。既然有了共同的文化，就不必要再有什么民族界线。李延寿将南、北两个政权看成并列的历史整体，没有因为南方是汉族就视为正统，这不仅是社会的客观存在对他的影响，也说明他在编写史书问题上，对多民族国家的态度是正确的。

《南史》的篇幅比起南朝四部正史少得多，必然有大量的选择和取舍。将四书与《南史》相对照，我们得知他删去了沈约《宋书》中大量的夹叙文字，同时也删了一些本纪中的册文诏令、列传中的奏议文章。但对齐、梁两代的史料却稍有增加。李延寿将一大堆史料删烦去冗，编辑连缀，文字颇有条理，突出了纪、传的叙事部分，读起来更为清

楚醒目。范文澜在《正史考略》中说,《南北史》虽删节很大,但并未影响史料的削弱;卷数虽少于八书,但读起来反觉充实。这种评价是中肯的,说明李延寿具有优秀的史才。

《南史》文笔简练,行文流畅,并强劲有力,这是历代史学家所公认的。北宋司马光在《贻刘道元书》中,对李延寿作了高度评价,认为他编写的《南北史》是近世之“佳史”,在史学家中,继陈寿之后,李延寿最有史才了。这评论公允恰当。《南史》通行后,南朝四部正史阅读的人反而少了,因为通编成一书,读起来比较方便;又因分量少,抄录容易,利于保存。到北宋时,正史多有散失,宋人即用《南北史》相补正。

《南史》除了有上述特点外,也有其不足之处。由于文字过分简练,因此在有些地方造成史实不相连接,阅读起来无法理解,如《谢灵运传》记载“宋武帝在长安”,但接着又说灵运奉使“慰劳武帝于彭城”。阅读《宋书》,方知晋安帝义熙十二年(416年)刘裕北伐后秦,派檀道济、王镇恶进军许、洛,他自己住在彭城,直到次年八月,王镇恶破长安,擒姚泓,九月,刘裕才到长安。如果只读《南史》,的确史实不明。从文字方面看,也有稍感文气不接、辞义晦涩的情况。赵翼就曾在《廿二

史札记》中指出过“《南史》过求简净之失。”所以，这次选译时，不能不采用直译和意译相结合的方法，以求史实连缀，文意明畅，字句通顺。

《南史》共八十卷，纪、传人物包含家传在内多达数千人，本书限于篇幅，只选译了四十三篇，有许多篇还必须节录。选文从时间上看，贯穿了宋、齐、梁、陈四代。在人物类型方面，南朝是文学和史学十分发达的时代，有些人既是文学家，又是史学家，故这一类人物的传记选得较多。也选了部分反映高门士族在没落过程中与寒门矛盾尖锐、士庶间等级界线森严的传记。《恩倖传》中的人物选得也较多。当时的自然科学家如祖冲之父子及陶弘景的传记同时选入。少数民族方面选了《诸蛮传》。梁末的侯景之乱本是南朝的一个重大事件，与士族没落也有直接联系，但因文字过长，未予选入，只选了几篇与这个事件有关的传记，借以反映这个事件。

总之，由于篇幅和选译者水平的限制，难免有挂一漏万和选文不当或译、注欠妥之处，敬请专家学者不吝赐教。此外，本书在选译过程中，得李运益教授指导和审阅稿件，又得研究生龙华、谢萌珍及傅政华同志大力协助，特此一并表示感谢。

西南师大汉语言文学文献研究所

漆泽邦

1986. 12